

惊心动魄的56天

1989年4月15日至6月9日每日纪实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

大地出版社

惊心动魄的56天

——1989年4月15日至6月9日每日纪实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

【大 衆 出 版 社】

书名 惊心动魄的56天

——1989年4月15日至6月9日每日纪实

编者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

责任编辑 冷铨清 苗苏菲

封面设计 张 弘

出版 大地出版社

(北京沙滩北街2号)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发行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开本 787×1092毫米 32开

印张 7.5 字数 158千字

版次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50001-250000册

书号 ISBN 7-80068-096-7/D·38

定价 2.60 元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内部发行

本书所有内部材料不得公开引用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大事记的形式，全面系统地介绍了1989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发生的学潮、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是4月15日至6月9日这惊心动魄的56天的真实记录。本书首先概要地介绍了这场动乱和暴乱出现的国际、国内背景，然后依据事件发生、发展过程逐日展开记述。每日，不仅有北京的情况，而且有各地发生的主要事件。全书按事态发展的不同阶段，分为六个部分。每部分都有提要性导语，便于读者更好地掌握各个阶段斗争的焦点和演变过程。本书所用材料翔实而准确，系以各地教育部门和高等学校的情况报告为基本依据，同时参阅了报刊披露的资料及有关部门的一些内部材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首次发表。本书不仅是对青年学生和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好教材，而且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对读者全面、深刻地认识这场斗争的真相、实质和意义很有帮助。

编者的话

1989年春夏之交，从4月中旬至6月上旬，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在极其复杂、严峻的形势面前，党中央和国务院排除种种干扰，顶住来自国际的巨大压力，作出正确的决策，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赢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本书辑录的材料准确、翔实，系以各地教育部门和高等学校的情况报告为基本依据，同时，参阅了报刊披露的资料及有关部门的一些内部材料。本书首先概要地介绍了这场动乱和暴乱出现的国际、国内背景。然后，依据事件发生、发展过程逐日展开记叙。每日，不仅有北京的情况，而且有各地发生的主要事件。全书共分六个部分：（一）山雨欲来（1989年4月15日以前），（二）风波骤起（4月15日至4月

25日)；(三)欲盖弥彰(4月26日至5月4日)；(四)急转直下(5月5日至5月19日)；(五)穷途末日(5月20日至6月2日)；(六)力挽狂澜(6月3日至6月9日)。每部分都有提要性导语，便于读者更好地掌握各个阶段斗争的焦点和演变过程。有助于读者深刻、全面地理解这次动乱和暴乱的真相、实质，以及这场斗争的必然性、尖锐性和复杂性，进一步加深对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正确性的认识。这正是编写本书的目的。

本书是国家教育委员会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织编定的，由于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刚刚平息，资料收集和整理还不够充分，认识水平有限，难免有疏漏、不妥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的补充修改意见。

国家教育委员会思想政治工作司

1989年7月28日

目 录

编者的话

- 一、山雨欲来（1989年4月15日以前）..... 1
 - 二、风波骤起（4月15日至4月25日）..... 15
 - 三、欲盖弥彰（4月26日至5月4日）..... 52
 - 四、急转直下（5月5日至5月19日）..... 92
 - 五、穷途末日（5月20日至6月2日）..... 143
 - 六、力挽狂澜（6月3日至6月9日）..... 198
-

一、山雨欲来(1989年4月15日以前)

早在1989年春夏之交前的一个时期，国内外敌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势力就在频繁活动，在中国的大地上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一切都充分表明，4月中旬爆发的这场动乱是酝酿、预谋已久的。

多少年来，西方和境外的一些政治势力，总是企图将社会主义国家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轨道。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一直是他们搞“和平演变”的重要目标。近几年，他们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之机，加紧了这个战略的实施。在我国，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的这种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为在中国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实现资本主义化，进行了多年的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

1988年9月19日，赵紫阳同志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该“经济学家”回美演讲时说，他和赵“从正反两面来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情形，赵紫阳明确表示，若一个领导人不能被充分授权的话，就无法推动经济改革”。

这次会见后，一些与赵紫阳“智囊团”有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大肆鼓噪，透露出“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

1988年10月31日，香港反动杂志《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一文，叫嚣“只有邓小平完全退休，才能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才会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继续推行改革开放的路线”。

1988年11月号香港《解放》杂志发表专篇文章《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称北京一些人同香港传播界某些知名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灭”的关系，这种微妙关系“有了一个最新的方案显示，那就是在最近一个月掀起的倒邓保赵风”，作者断言，对西方和港台一些人，“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

香港反动杂志《争鸣》1989年1月号在发表与赵紫阳同志会见的美“经济学家”回美演讲的同时，还发表了美国人写的《九条建议》一文，要求邓小平等老一代“正式宣布全退”，“胡耀邦、方励之、王若水、刘宾雁官复原职”。“释放魏京生、王希哲等政治犯”。

陪同美“经济学家”会见赵紫阳的香港某教授，回港后在香港《经济时报》发表《假如赵紫阳是个独裁者》，妄称要改变中国200年来的悲剧历史，只有进行“独裁改革”。

“邓小平已年高84，将中国今后经济改革的问题转移到赵紫阳身上，是很自然的”，赵紫阳“要有蒋经国那样的权力，中国才有希望”。

1989年2月号香港反动杂志《九十年代》发表齐辛《中共智囊人物谈政经大势》的文章，称笔者在港遇到“赵紫阳的中青年智囊团”中的“一个要角”，了解到这批人的“主要想法”：大约不出10年左右，老一辈全部凋零，新一代接

班，中国会在政治上有大的改革。

同这种“倒邓保赵”风相配合，北京《经济学周报》于1988年12月11日发表了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与温元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关于时局的对话。严家其提出，“中国面临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对话的核心问题是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

在美国，政界的一些人物始终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近几年，他们竭力支持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一类的政治反对派，培植王炳章、胡平等人在美国搞起来的“中国民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一些人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机构的某些主要成员身上下功夫。他们认为这些人会对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最高决策机构起潜移默化影响。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特务在推荐原国务院办公厅研究室一名工作人员访美时写道，这“有助于打开国务院神奇的至今尚未打开的大门”。从1987年至1988年一年内，仅他一人就推荐了体改委系统的12人访美，成行11人。

1986年初，某一美国人向体改所表示，他愿意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会的模式，资助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研究活动。同年6月，在这位美国先生资助下，陈一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与他在国外就建立“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一事交换意见。10月，陈与他在北京会谈并签署协议，责成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李湘鲁筹建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随后，这位

美国人表示，他想与我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就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交换意见。陈一谔说，基金会成立过程中，鲍彤曾向赵紫阳打过招呼，赵也同意。

1989年1月7日，美国某基金会向“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汇来25万美元。据了解，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笔特别经费，它的使用将对中国的开放造成严重损害，使中国领袖人物造成难堪的局面”。至1989年5月，美方共汇来250万美元，基本上用于四个方面：①体改委及其下属一些人出访美国的费用开支，以及接待美方来人的支出；②进口50万美元的西方社会科学类书籍；③拨出25万美元计划建立一个政治沙龙性的俱乐部；④用于一些文化建设。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等上述机构的主要成员，都曾使用这个基金会的钱去美国。

1989年5月下旬，还是这位美国人给中方主席来信，提出终止协议，关闭基金会，理由有两条：一是鉴于中国的局势；二是赵紫阳先生离开了领导岗位。他终于揭去面纱，亮出了真相。

1988年下半年至1989年4月15日前，海内外敌对势力进一步加紧勾结，他们紧锣密鼓，加紧进行挑起政治动乱的准备。方励之频繁接受香港和国外记者采访，继续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鼓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北京等地陆续出现了一些观点非常错误甚至反动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他活动。今年初以来，企图以人权问题、公开支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为突破口，在“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起事。

1988年5月16日，方励之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裴欣采访

时直接攻击邓小平同志。方说，“在政治方面，邓小平做的很多事，表现他不需要真正的改革。比如说，魏京生事件、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系列事件已经表示他的观点。”

6月14日，香港《时报》报道说，方励之昨天在北京说，最大的问题是中共的独占体制，唯有变革所有制为“私有制”方是根本方法。

9月2日，香港《时报》再次报道方励之攻击中国共产党妄图组织反对党的谈话。方励之鼓吹，除共产党外，大陆需加入反对党，以发挥相互制衡作用。他叫嚷说，民间组织反对党与中国共产党对抗的形势将会出现，并会成为一个趋势，因为，这亦是一个“世界潮流”。

9月6日，香港《时报》发表《方励之谈大陆知识分子处境》一文。方说，“大陆知识分子争取民主的长期目标是多党制的民主制度，近程的目标是实现必要人权，争取言论、思想、新闻等自由”。他还攻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说“马克思主义在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实践，都得到错误的结论”；“一定要彻底批判毛泽东思想才能改革。不能绕开这个关键问题”。

9月16日，香港《时报》报道，方励之在香港说，大陆的出路，就是“资本主义化”，“整个的要改弦更张”。

11月13日，美联社和《纽约时报》报道，方励之于11日在北大宿舍与记者交谈中，严厉批评了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在谈到所有制问题时，方说，“这里他们说是公有制，但这等于是领导人所有制。这比私有制更糟。”他说，政府应当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鼓励私人所有制。

1988年10月，台湾特务机关化名“唐怀民”，向天津22所高校、北京近70所高校投寄煽动“12·9”闹事的反动宣传品。11月20日，又发现“唐怀民”给天津高校投寄反动宣传品。信中煽动说，“方励之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民主的命运”，“我们怎能让他孤军作战？”“相信今年的‘12·9’运动将在您我共同策划下，象1986年那样风起云涌，迅速扩及全国29省市”，“定会震撼中南海的领导们”。

11月5日，张显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包遵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温元凯等人参加由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主办的“传统与现代”报告会。他们说，不仅在科技上，而且在政治上、文化上也要学习西方，“全盘西化也是可以的”，“目前应大力争取自由，首先是言论自由”。

11月7日，南京航空学院在教室墙壁和课桌上发现反动标语，煽动学生“造反吧”，“这世界我们无法生存”，“我们的忍耐已到了最大的极限”。并鼓动说，“快放下你们心中的课本，也丢下你们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加入我们的行列中吧，人民会感谢你，历史会记住你”。疯狂叫嚷“国民党万岁！万万岁！打倒共产党！”

11月9日和16日，华中师范大学一87级学生两次在校内举办“闲聊沙龙”。该校86年学潮的带头人之一、学生廖宝斌表现十分活跃，四次发言。他煽动说，历史的前进总是要依靠暴力革命，依靠人民的斗争。波兰的工人觉醒了，靠斗争取得了地位，团结工会很有力量。廖还别有用心地说，教育的危机其根源就在于社会的危机，我们现行的社会的经

济、政治以及它们的体制存在着危机。

11月12日，南京农业大学在某教室的黑板上发现署名为“民权行动党”的反动标语，叫嚷“是多党专政，还是一党独裁统治？共产党腐败专制统治的日子早该结束了。”

11月15日，兰州大学哲学系3名学生在校内贴出名为《野狼嗥》的墙报。发刊词将兰州大学和社会比作大羊圈，将各级积极分子比作狗，称他们自己是几条“北方的野狼”。要“向这昏睡的荒原大声地嗥叫，肆无忌惮地发出自己内心的呼声”。发刊词的作者说，“对这狗的世界充满生理上的憎鄙和痛恨，面对这古老的大羊圈深感悲哀”，他们要“呼唤自由，呼唤民主，呼唤人性的解放和发扬，呼唤个性的恢弘和伸展”，“高举人道主义的神圣大旗”等等。他们还吹捧“刘宾雁是好样的，他不怕说真话”，“刘晓波也是，他不迷信任何权威，勇于独抒己见”。

12月7日，由《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金观涛担任顾问的“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了“未来中国与世界”大型讨论会。金观涛在发言中说，20世纪“另外一个遗产是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它的失败”。《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以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年龄最大”者的身份“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她还胡说“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一种封建社会，它的头子必然是皇帝”。

12月28日，《世界经济导报》用一个多版面的篇幅发表了苏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理论讨论会”上的发言。苏绍智说，“这十年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叫运动的运动，不叫

学术大批判的学术大批判还是有的。最大的两次是‘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实质上还是‘学术大批判’的翻版”。他为王若水等人因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受处理鸣冤叫屈，说他们“因‘清污’和‘反自由化’而受到不公正待遇”。他认为，“‘清污’和‘反自由化’是十年来理论界最重大的问题”。

1989年1、2月号《中国青年》杂志先后刊登了苏绍智的《1989年提示我们》和《严家其谈德先生、赛先生、洛先生与今日中国》两篇文章。文章诬蔑我国存在着严重的“封建专制主义”。苏绍智说，“在中国发展民主与科学的艰难道路上，封建专制主义始终是头号大敌。这个旧制度、旧社会、旧道德的‘幽灵’时常在现实中徘徊游荡，并且不断用改头换面的形式作用影响于我们的社会。”“事实上，封建专制主义始终作用影响于我们的社会。”苏绍智攻击我党“铁的纪律、一元化领导”等是“旧的做法”，并说“旧的做法日益变成了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工具”。苏绍智还鼓吹，“惟有多元化政治局面才是发展现代法制社会的有效途径”。

严家其与苏绍智紧密配合，大谈什么“20世纪的中国，帝制的阴魂不散，谁取得权力，不仅想大权独揽，而且想象皇帝那样终身任职”。严家其诬蔑说，“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消除。”他还说，“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至今仍严重地束缚着中国人”，“人们仍受到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及教条的束缚”。

1月初，香港《争鸣》杂志、国际人权同盟、国际大赦组织、中国海外艺术家联盟、法中友协、《今日中国》编辑

部、法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中心等联合发出呼吁书，要求“中国政府释放魏京生等一切政治犯”。

1月3日至2月9日，美国、瑞士等人权组织，指责我“侵犯人权”，指名道姓地要求我释放民族、宗教方面的犯罪分子。

1月6日，方励之发出《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公开信》，建议释放政治犯，释放魏京生。

1月12日，原北京自发组织“星星画会”部分成员在香港举办“星星画会十周年画展”，该组织头头王克平称：他已写了《重审魏京生》剧本，拟于3月份在法国上演，届时将在海内外掀起一个释放魏京生的高潮。

1月21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刘小平在方励之的支持下，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要在中国争取人权。

1月28日，苏绍智、方励之等人在北京的“都乐书屋”搞了所谓“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的除中国人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百余人。方励之在会上煽动说，“现在中国主要的是人权问题，需要行动，号召大家起来争取人权”。方励之说，这类集会“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连开三次就要上街了”。

1月下旬，王若望声称，他准备在美国发起成立“中国人权保障大同盟”，争取在国内正式申请注册。

2月3日，“星星画会”部分成员在北京外交公寓举行义卖活动，为资助魏京生等罪犯家属筹集资金。

2月4日，方励之、陈军（原上海非法组织“民主之声”骨干分子，反动组织“中国民联”成员）等人参加在北京友

谊宾馆举行的所谓“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鼓吹，“知识分子应该成为一个后力团体”，“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民主而斗争”。

2月8日，“中国民联”成员倪育贤在美国成立了“促进中国民主化联络组”，准备发起十几万人的签名运动，同时与方励之联系，以呼应释放魏京生。

2月13日，经原北京自发组织“今天”头头北岛发起，由陈军出面，联系了33名知名的知识分子联合发出《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在建国40周年和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

2月16日，陈军在京举行“外国驻京记者新闻发布会”，散发了方励之致邓小平及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

2月17日，方励之和在美国的倪育贤、香港的李怡等53人联合发起《促进中国民主改革宣言》，要求中国政府开放办报刊，保障结社自由，民选区县首长，释放政治犯等，并号召开展全民签名运动。

2月19日，陈军召集外国驻京记者和“中国现代艺术展”部分作者集会，宣布设立释放魏京生公开信签名联络处，并策划在工厂、学校中征集签名，争取工人、学生的支持，企图提交到3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讨论表决。

2月23日，台湾《联合报》发表《大运动的开端，大冲击！》的文章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州春雷动，民主浪潮涌”。

2月26日，张显扬、李洪林（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